

人口政策论争之我见

——基于劳动力角度的思考

◆蔡晓薇 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尝试从劳动力不足的角度来探讨目前人口学界的重要争论——是要“严格一胎化”还是“全面放开二胎”，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作者自己的观点，即现阶段我国实行的以“继续稳定低生育率”为核心的人口政策是恰当性的，并对中国人口政策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

【关键词】人口政策 资源 劳动力不足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自1980年代初严格实施“一胎化”后，30年中，生育政策逐渐出现松动，从当初严格的“一胎化”逐步过渡到部分人群和地区允许生育二胎。近几年来，是否应该实行更广泛的二胎政策逐渐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两会提交《关于尽早着手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提出了“放开二胎刻不容缓”的观点。

与此同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提出了截然相反的人口政策主张。他提出，应实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方式，实现人口素质的较快提升，从而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进而解决中国正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诸多问题。

于是，关于中国的人口政策应该作何调整，成为了学术界讨论的一大热点。因此，本文就针对这两种观点，尝试从劳动力不足的角度来探讨“放开二胎”与“严格一胎”这两大主张的立论基础，进而论证现阶段所实行的人口政策的恰当性。

一、“严格的一胎化”还是“全面放开二胎”？——反思劳动力不足问题

现在我们再来看坚持“全面放开二胎”论调的重要的立足点之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8，低于更替水平之下。中国人口下降迟早会发生，到时候人口下降将导致劳动力不足，老龄化加剧，社会负担严重。如果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数量问题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么现在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主要矛盾，例如未富先老的老龄化问题，青壮年大幅度下降，而很多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跟不上，往往导致社会矛盾重重。

所以，要回答是否应该全面放开二胎，来缓解老龄化问题等人口结构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先来看中国人口下降将以什么样的机制实现，此机制的运作将使社会组织及其运作方式面临什么样的挑战？需要做什么样的调适？从而再来看全面放开二胎是否有其必要性。

一个社会出生率的下降，会使一代人以后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比例下降而老龄人口比例增大，也就是平均一个劳动者要以其劳动来负担的非劳动人口数将会增加，这便是人口下降会导致劳动力不足的原因。例如美国在二战后的生育高峰后进入一个出生率相对较低的时期，现在，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一代人已开始相继进入退休年龄，便让美国政府感到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在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下，政府得为退休者提供不少养老金。退休者自己不从事生产活动了，拿着养老金要购买的物品就得由现在处于工作年龄的人来生产，由于他们占人口比例比较高，购买力又比较强，这就有可能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劳动力相对不足。

那么，要解决劳动力不足，是否需要通过放开二胎刺激生育率来增加人口数量呢？

其实，要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容易想到的一个思路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多搞自动化，以减少生产体系对劳动力的需求。以现代科技的水平，很多生产领域可以不用多少劳动力就能维持，例如，粮食的生产在历史上曾经是困扰很多国家的重大问题，但在现代，美国仅有3%左右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却不仅能满足本国的需要，还能大量地向别国出口粮食，这便是现代科技之力量的一个典型的体现。从理论上说，如果让现代科技充分发挥作用，在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情况

下，要解决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问题似乎也并非难事。此外，现代科技也使很多种工作的繁重程度大为下降，成为老年人也可适当从事的工作。这样，老年人也不是必然要成为完全依靠年轻人的纯消费者。

然而，如果要问以什么具体的机制来实现上述的目的，会涉及一个更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分配体制的问题了。科技只是提供了由少数人生产足够所有人消费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手段，但由少数人生产的生活资料如何能合法地转移给大量的非生产人员消费呢？在讨论中国也将面临的老龄化问题，也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生育政策再加上传统的孝的观念，会使未来处于工作年龄的人不堪重负，因为很多家庭中一对夫妇除抚养子女外，还将得负担赡养四位老人的责任。要解决这个问题，得由政府加强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以减轻一般家庭的负担。但是细细琢磨一下，这种观点不无问题：政府的钱不会无中生有，如果由政府出资建立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这钱最后也得从社会获取，只不过是政府做一下再分配而已。由政府来建立一个庞大的保障体制，得增加政府相关部门运行费用的成本。从各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做法来看，由政府负责也只是一种模式。例如，日本长期实行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由企业为职工提供一种保障，与美国的政府负责那样的模式大相径庭。

由此可以设想中国未必必要全面放开二胎，要解决劳动力不足、老龄化的问题，可以尝试探索一下结合现代科技和传统孝道相结合的模式来处理老龄化问题，政府与社会将主要的努力用于发挥现代科技的力量，创造条件使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的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同时也增加他们的收入，使之有能力赡养父母。政府需要直接履行的社会保障功能仅限于无子女或有其他特殊情形的少数老年人。这样，子女年幼时由父母抚养，父母年老后由子女赡养，不仅能为中国人所珍视的亲情和天伦之乐创造更多的空间，也更符合社会交换中基于互反性的公平原则。

所以，劳动人口的相对减少是一种必然趋势，而靠增加出生率的做法（即全面放开二胎）是一种靠增加人口数（增加分母）来增加社会财富的解决办法，在当代社会已经不是唯一的办法，并且笔者认为也是不大科学的办法。因为全面放开二胎来补充社会劳动力是需要相当的时间的，暂且不论是否能够真的实现未来劳动力人口数量上的要求，笔者认为，现代社会更应该依靠完善的保障制度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来达到未雨绸缪的目的，而不是回到“养儿防老”的老路上去。

二、反思我国现阶段的人口政策——稳定低生育率

2002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就中国现阶段的人口政策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既不是一胎化的政策，也不是一个孩子的政策。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四川等省，实行的是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实行的是农村普遍生两个孩子的政策。西藏地区没有生育孩子数量的限制。其他大部分省在农村实行的是第一个生女孩的，可以再生一个。在城市，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两个。还有六个省规定，在农村一方是独生子女的，也可以生两个。”由此可见，中国的生育政策相当复杂，这也是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状态下而决定的分类指导的政策。既不是所谓的一胎化，也没有全面放开二胎，而是一胎与二胎相结合的“第（上转 133页）

开发重庆红色旅游的思考

◆梁 莹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摘要】发展红色旅游作为我国的一项政治、文化和经济工程,对于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和发展旅游业都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重庆发展红色旅游进行研究,剖析了目前重庆市发展红色旅游的现状,并根据重庆市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红色旅游的对策。

【关键词】红色旅游 重庆 开发

红色旅游,主要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发展红色旅游有利于在广大干群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又有利于把革命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推动经济发展。这既是一项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工程,一项关系发展先进文化的文化工程,又是一项关系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经济工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4年底印发的《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就发展红色旅游的总思路、总体布局和主要措施作出明确规定,表明国家将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产业。在政府高层的推动下,各革命纪念地掀起了一股大力开发红色旅游的热潮。《纲要》颁布以来,全国红色旅游蓬勃发展,势头强劲,成效明显。到2008年10月,全国红色旅游接待总人数累计逾4亿人次,红色旅游综合收入达到1500亿元;直接从业人员近40万人,间接从业人员超过143万人。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已有73个获得国家A级景区称号;新建和改造了187个红色旅游项目,维护修缮了一大批红色遗存,保护了一大批红色文物,支持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改陈布展,培训红色旅游管理和导游讲解人员1100余人次。

一、重庆红色旅游概况

1 重庆红色旅游资源的优势。重庆作为全国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拥有丰厚的红色旅游资源,全市拥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6个,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4个,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战争时期领导人民推进解放事业有关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个。其中渝中区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沙坪坝区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开县刘伯承同志纪念馆,江津县聂荣臻元帅陈列馆,酉阳县赵世炎烈士故居被列为全国百个红色经典旅游景区。重庆市红色旅游景区开发较早,有较好的市场基础,同时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尤其是红岩系列景区,因为小说《红岩》而家喻户晓,其中江姐、双枪老太婆、小萝卜头等艺术形象深入人心,对游客有极大的吸引力。许多游客到此既为缅怀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了解历史,同时也感受一种艺术魅力。

2 重庆红色旅游资源的劣势。在重庆的红色旅游资源中除红岩村、渣滓洞、白公馆、歌乐山等是全国知名的红色旅游品牌,有较好的接待能力外,红色旅游景区大部分位于偏远山村或革命老区,整体经济实力较弱。大部分红色旅游景区基础设施不完善,景区内外国道不通畅,可进入性差,餐饮、住宿、购物设施等产业要素不健全,旅游产业化水平低。部分红色旅游景点单一化,对游客吸引力不大且难以留下深刻印象。

二、重庆红色旅游发展的对策

1 重点发展,打造精品。重庆有老牌的红色旅游品牌,一直在全国的红色旅游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众多的红色旅游资源中,应重点发展红岩系列景区,通过宣传和弘扬红岩精神,进一步扩大市场需求,并同时在旅游接待设施、服务、交通道路条件等方面加强建设。除此之外,江津聂荣臻元帅陈列馆、酉阳赵世炎烈士故居都很受旅游者欢迎,

可以依托当地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把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民俗旅游相结合,对各类旅游资源进行整合,更好的开发和利用。形成与生态旅游、文物文化旅游、民俗旅游结合的新思路。比如江津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可以和四面山国家森林公园风景区进行组合,酉阳赵世炎烈士故居可以和酉阳县土家族民俗风情进行组合。

2 挖掘红色内涵,提高产品吸引力。发展红色旅游除了具备其他各种旅游形式的基本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外,还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在发展红色旅游、开发红色旅游资源的时候,应充分认识并利用红色旅游资源的这些特点,挖掘红色内涵,使旅游者从中受到教育。

2.1 学习性:红色旅游的学习性,主要是指以学习中国革命史为目的,以旅游为手段,学习和旅游互为表里。但是,这种学习不宜搞成灌输式的“现场报告会”,而应营造出自我启发的教育氛围,达到“游中学、学中游”,寓教于游、润心无声的境界。比如在渣滓洞、白公馆景区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和舞台表演形式,重现当年革命烈士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意志和精神就是非常好的例子。旅游与学习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我国有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现在开展的红色旅游,是这个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它可以归类于修学的大类,可以列入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团工会组织的爱国主义教育序列。

2.2 参与性:红色旅游应突出旅游节目的参与性。红色旅游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性学习,开发红色旅游,要设计、组合出具有实践和参与性特点的产品来。近年来,有些红色旅游景点开展了一定的参与性活动,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多数还只是停留在化妆拍照、观赏节目、饭菜品尝等浅层次上。在白公馆景区开展过革命诗歌朗诵会,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中还设置了“我的小萝卜头童年生活”绘画比赛等参与性强的项目,都是很好的借鉴。

2.3 扩展性:部分红色旅游产品留存下来的革命遗物数少、量小、陈旧、分散,具有内容、场地、线路等方面的局限性。红色旅游要千方百计扩展产品链,延长旅游者的游览时间,增加其消费时间、内容和金额。扩展产品链还要与当地的观光、休闲、度假等旅游产品相连接,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从而扩展红色旅游的功能。同时也可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加大红色旅游业的投入,提升红色旅游地档次。

3 加强宣传,树立品牌形象。开发红色旅游,必须要有品牌意识和宣传意识。在传统媒体营销方面,可以在城市建筑、公共汽车、高速公路上设立大型户外广告宣传展示牌;在城市中心、广场和街区搭建重庆红色旅游宣传长廊;在博物馆、展览馆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在影响力较大的媒体上发布广告,如在《中国旅游报》刊登整版专题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宣传短片。在网络营销方面,主要通过两个优势站点进行宣传,一是通过重庆的官方网站——重庆旅游信息网整合全市各地的网站,构建红色旅游管理信息系统;二是通过专题网站——红色旅游网挖掘历史内涵,形成品位较高的文化网站。

参考文献:

- [1] 邹统钜. 旅游开发与规划.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9
- [2] 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 2004.

(下接161页)三条道路”。笔者认为,现阶段采取这样的人口政策是符合中国的国情,以“稳定低生育水平”为宗旨,而不是继续降低或者提高生育水平,是比较恰当合适的。因为正如之前论述的,面对资源与人口确实存在矛盾,即使放开二胎的试点成功,也不能断定全面放开二胎不会造成人口的不恰当增长,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并不能完全依靠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来达到;但是严格的一胎化也不是解决资源问题的最好办法,并且不符合人们的生育意愿,更会加大生育风险,这在目前也是不合适的。所以,现阶段采取稳定低生育水平,确保人口的发展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保持人口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参考文献:

- [1] 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 2003《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

育政策的多样性》,《人口研究》第5期。

- [2] 蒋正华, 2006《新时期人口政策思考》,《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 [3] 刘家强, 2004《人口经济学新论》,四川: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 [4] 汪孝宗, 2009《人口政策大争鸣:“一胎化”还是“放开二胎”?》,《中国经济周刊》第11期。

- [5] 王金营, 2006《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果评估》,《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 [6] 王学义,《人口转变、人口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基于中西方经验认识基础上的理论分析框架》,《生态经济》第10期。